

# 正在衰亡的语言少数共同体 能够挽救吗？

——爱尔兰语的经历提供的教益

〔爱〕德斯蒙德·芬内尔\*

本文所说的“语言少数共同体”（linguistic minority）系指一国内某一个或某一群定居的人们共同体，他们使用与占支配地位的语言不同的另一种语言。

在今日的西欧，存在着许多正在衰亡的语言少数共同体。其中每一少数共同体都有一些热心的支持者，想阻止它继续衰亡，因为他们珍视这种语言，珍视或多或少与它密切相关的那种独特的文化。这些自封的救星们相信，只要国家采取适当措施，便能阻止他们所关心的那一共同体消亡。尤其是在这种日趋衰亡的语言少数共同体在一个没有独自国家的民族内部形成少数的地方——比如苏格兰操盖尔语的少数民族，威尔士和欧斯卡迪分别操威尔士语和巴斯克语的少数民族——这些自封的救星们往往相信，假如他们的民族有自己的国家，那么这个国家就有可能、也一定会阻止这种逐渐侵蚀。

挽救正在衰亡的语言少数共同体是可能的吗？尤其是，通过国家能做到这一点吗？本文

- 
- \* 德斯蒙德·芬内尔执教于爱尔兰共和国高尔韦大学学院历史系。本文是他于1980年9月在英国格拉斯哥大学举行的第一届国际少数民族语言讨论会上宣读的论文。——译者

---

然而，那仅仅是消极的一面。虽然摆在面前的肯定是危险而艰苦的日子，但是前途并不都是那么暗淡的。美国霸权主义地位的削弱、大量“国内的第三世界”以及民权运动的历史根源，都将为革命的左派的出现提供条件，而这种革命的左派终久将作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自三十年代以来首次出现在美国。

## 结 束 语

那么，种族主义在当代世界中有什么意义呢？这就是少数民族人民蒙受混乱局面的最大痛苦，而这种混乱局面却是资本主义制度正常现象的组成部分。混乱局面就是失业、就业不足、贫困、种族隔离、文化帝国主义、警察暴行以及战争等等。种族主义暴露了资本主义的邪恶而残忍的真实面貌。资本主义产生的只是身无分文的无产阶级以及只会是失掉身上锁链的广大群众。这就是统治阶级害怕的定时炸弹，也是右翼在这段时期进行总动员的真实含义。包括工人阶级妇女在内的少数民族是美国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阶层的社会事件的总爆发仅仅是个时间问题。正是这一指望使人们看到，民族运动不仅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而且是革命的无产阶级运动的核心。

（林佐森摘译自美国《当代马克思主义》1982年冬季号）

试图回答这个双重的问題。作为探求答案的一种途径,本文对于六十多年来在爱尔兰为挽救操爱尔兰语的语言少数共同体所作的尝试进行一番考察。这是一个很恰当的事例,一方面因为这是迄今在欧洲为挽救正在衰亡的语言少数共同体进行的规模最大、也最为全面的一次尝试,另一方面,也因为这项工作是由代表该语言少数共同体所属的民族政府亲自进行的。

爱尔兰语或盖尔语(这是它的另一个名称)曾是最初的爱尔兰民族的语言,这个民族的人自称为盖尔人。直到十六世纪之前,它都是整个爱尔兰的共同语言。从那时以来到二十世纪初叶,在英国统治下,语言逐渐发生了变化。在整个国家的社会由东向西逐渐演变的过程中,人们改变了他们的语言,爱尔兰语换成了英语。十九世纪末期,开始了一场复兴爱尔兰语的运动。这一运动主要以位于东海岸中心地区的行政首府都柏林及其他讲英语的城镇为基地。这一运动(它激发了1916—1921年的政治革命)的目的之一是保存日趋衰亡的操爱尔兰语的人们共同体,这些共同体主要分布在西海岸附近。它们所占的区域,即爱尔兰语为通用语言的地区,通称为盖尔塔奇特(Gaeltacht)。我们在十九世纪从苏格兰语中袭用了这一名称。当爱尔兰国家在1922年建立并定都于都柏林时,它在文化方面的两个主要目标就是:在讲英语的爱尔兰地区复兴爱尔兰语和“挽救盖尔塔奇特”。

幸存的盖尔塔奇特共同体几乎全是农村。它们大部分位于土地十分贫瘠的地区。由于这一原因,加上人口密度高,这些地区大都十分贫困,以致大批移民出境,流向美国和英国。政府任命了一个委员会,考察应采取何种措施防止盖尔塔奇特受到进一步侵蚀。这个委员会,即1926年成立的盖尔塔奇特委员会报告说,有三件事情必须做:一、抵制在盖尔塔奇特广泛存在的一种自卑感,即认为爱尔兰语是低人一等和贫困的象征;二、消除学校和行政系统施加的有利于英语的压力;三、提高盖尔塔奇特的生活水平,改善它的经济状况。这些建议确实为当时的政府以及其后历届政府所采纳,作为对盖尔塔奇特政策的指导方针。

### 挽救盖尔塔奇特的尝试

为了挽救盖尔塔奇特,同时也为了在说英语的爱尔兰地区复兴爱尔兰语,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历届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范围广泛的措施,并得到了议会和人民的赞同。宪法宣布爱尔兰语为第一民族语言。爱尔兰语被定为一切学校必修的考试课程,进公共行政部门任职都必须讲爱尔兰语。从独立以前开始,五所大学学院就有四所以爱尔兰语作为入学的必修语。建立了几所师范学院来培养用爱尔兰语讲授一切课程的教师,爱尔兰语被定为盖尔塔奇特所有学校的教学用语。在盖尔塔奇特工作的警察和教师享受额外津贴。盖尔塔奇特家庭的每一个孩子只要是操爱尔兰语并有学校督察员签署的证明,其父母均可获得补贴,开始是两镑,后来是十镑;而且,一个家庭的孩子所取得的获取这种补贴的合格证明还被当作具备领取其他各种津贴的资格的标准,诸如专门的建房补贴,盖尔塔奇特孩子预定要受的三级教育的奖学金,以及认可该家庭有资格向前来盖尔塔奇特参加夏季语言学院学习的学生出租房间的证明。

1956年成立了一个专门的盖尔塔奇特部,由一位部长领导,与政府其他各部并列。它的职能并不是代替中央和地方政府在盖尔塔奇特的一般的代理机构。其他各部及中央政府在盖尔塔奇特的各代理机构一如既往,在盖尔塔奇特继续行使其职权。新成立的这个部的职能仅在于协调对盖尔塔奇特采取的各项专门措施。1958年成立了负责盖尔塔奇特经济发展的国家公司——爱尔兰盖尔公司,1968年该公司又将其总部从都柏林迁至盖尔塔奇特。开始时该公

司的活动仅限于对盖尔塔奇特已经建立的纺织和玩具工业加以组织并安排销售。然而在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它逐渐成为一个负责将各种工业企业(本国的和外国的)吸引到盖尔塔奇特来、负责开发盖尔塔奇特的自然资源并鼓励人们在盖尔塔奇特一切领域兴办企业的机构。

自1926年国营广播事业创办以来就有了爱尔兰语广播节目。电视事业开办后也是如此。其后,在1971年,为了响应盖尔塔奇特的一项政治运动,政府又授权国家广播机构建立专门的盖尔塔奇特广播电台,并在三个主要的盖尔塔奇特地区克里、康内马拉和多内加尔建立播音室。还应提及的一点是,自从二十年代以来,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响应政府的坚决主张和民众的要求,天主教会也采取措施,向盖尔塔奇特派遣了操爱尔兰语的教士。自1960年用本地语取代拉丁语以来,盖尔塔奇特的全部宗教事务都是用爱尔兰语进行的。

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爱尔兰语在盖尔塔奇特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或多或少地使用起来,包括它从前受到排斥的若干领域,并成为大多数领域使用的正规语言。到七十年代时,从盖尔塔奇特向国外移民实际上已经停止。恶劣的生活条件实际上也已消除,贫穷困苦转变为繁荣昌盛,特别是近十五年来更是如此。然而,在上述整个期间,英语取代爱尔兰语的这种语言变化一直在沿着盖尔塔奇特边缘地区继续进行。盖尔塔奇特的地域一直在继续缩小,而这一情况的直接结果便是人口不断减少。

1926年,盖尔塔奇特委员会规定了“爱尔兰语言区”和“准爱尔兰语言区”。前者是一批行政区属选区(最小的行政单位),据1925年的统计数字,这些地区有80%或更多的人操爱尔兰语。1926年人口普查时,这几个区查明共有13万人操爱尔兰语。“准爱尔兰语言区”则是操爱尔兰语人口占25%—79%的一批行政区属选区,据同一次人口普查确认,这些地区操爱尔兰语的人数为11.7万人。因此,这两类地区——也叫“真盖尔塔奇特”和“准盖尔塔奇特”——在1926年共有24.7万人操爱尔兰语。

迄至1956年盖尔塔奇特部设立之前,上述情况都与政府在确定它试图挽救的盖尔塔奇特的范围时所得出的结果相接近。1956年又重新划定了盖尔塔奇特的范围,但未进一步细分,只是笼统地划出了一批操爱尔兰语人数占50%—100%的行政区属选区及准行政区属选区。就其总的范围而言,这样划定的地域比1926年构成正式的“爱尔兰语言区”的地域要小得多。它包括的人口总数为8.6万人,其中有6.4万人操爱尔兰语。但当时人们就知道,甚至这样一片已经缩小了的正式的盖尔塔奇特都包含了相当大片的实际上说英语的地带,特别是在马尤,但其他地区也一样。为什么把这些地带也算进去,其原因与局部性质的政治考虑有关,本文对此不拟探究。

1971年的人口普查表明官方划定的盖尔塔奇特地区的人口为7.1万人。1975年和1976年笔者对盖尔塔奇特进行了实地调查,对不同行政区的人口进行了估算,并画出了一些粗略的地图。我最后画定的那张地图(载于1976年5月21日的《Amárach》,随后广播电台又详为引述,电视里也作了介绍)表明,官方划定的盖尔塔奇特地区中较大的一部分及其人口的大多数实际上讲的是英语,而真正的盖尔塔奇特所含的人口仅2.9万人,分布在四个主要的行政区——两个区在多内加尔,另外两个区分别在高尔韦和克里——及八个“小块地区”,每个“小块”的人数不到1千人。我确定这些行政区和小块地区的标准是:使用爱尔兰语作为日常交往的标准语。对于这些调查结果的实际准确性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

此外,在七十年代期间,在操爱尔兰语的几个主要区域,大多数父母开始培养他们的孩子讲英语。现在在大部分地区,一个家庭如果培养孩子讲爱尔兰语,就会招致物议。既然这

种局面通常都是某一讲爱尔兰语的地区消失的前兆，那么可以公正地说，盖尔塔奇特最后消亡的时日已经在望了。

据人口普查记载，在本文论及的这段时期内——也就是说，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爱尔兰共和国内讲爱尔兰语的人数是在不断增长的。在最近一次（1971年）人口普查中，这种人数达到了80万人，占人口总数的26%。就威尔士和苏格兰而言，那里讲威尔士盖尔语及苏格兰盖尔语的相应的百分比统计数字分别为20%和1.7%，这些统计数字表示的实际上是成年人加上孩子的人数，而这些孩子则是根据其家长“会讲爱尔兰语”而随之登记在人口普查登记表上的。

### 这种尝试为什么会失败

爱尔兰国家为挽救盖尔塔奇特作了长达六十年的尝试，为什么终于失败呢？这种尝试依据的是一种错误的设想，而作出这种设想的不仅是爱尔兰政府，概而言之，还有那场语言运动和爱尔兰人民。这种设想大致说来就是：国家官方机构、半官方的公司特别是爱尔兰盖尔公司能够阻止盖尔塔奇特衰亡。政府依据这种设想办事，于是便把这一任务交给了各代理机构。然而，指望这些机构能完成那样的任务，这种想法是大错而特错了。只要我们向自己提出一个简单的问题，这一点便一目了然。

假如某一地区通常讲一种特定的语言，而这个地区又因其边缘地区的语言变化而不断缩小，那么谁又能阻止它缩小呢？很清楚，只有该地区的人民——靠他们作出决定并采取适当措施。因此，说明这个国家何以未能挽救盖尔塔奇特的另一种方法，就是指出政府对这一事实未能领悟，因而未能相应地采取行动。它并未认真试图说服盖尔塔奇特人民，让他们自己决定阻止这种侵蚀——它甚至从未向他们的代表会议询问他们是否打算试图阻止这种侵蚀；它也没有建立一个地区性的代表机构，让它促使人民“采取适当的措施”。

相反，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政府试图通过它的各种代办机构去代表人民做这件工作，而不要他们自己承担义务，采取行动，去阻止这种语言的侵蚀。这种做法显然是荒谬的，明眼人一看便知。

在本文论及的大部分时期内，盖尔塔奇特本身对它自己的存亡问题未置一词。盖尔塔奇特人民对于政府出面为他们和针对他们办的这些事，都是共同接受并表示欢迎的。与此同时，在盖尔塔奇特边缘地区，一批又一批的家庭、人群和城镇却持续不断地参与了语言变化的社会过程，这种变化过程长达四个世纪，贯穿了整个爱尔兰。直到1969—1970年，才有一小批盖尔塔奇特人（首先是在康内马拉南部，随后又遍及整个盖尔塔奇特）为盖尔塔奇特的生存问题大声疾呼。这就是我在上文提及的那场政治运动。它的主要组织形式是康内马拉南部的盖尔塔奇特民权运动，笔者当时就住在那里。在我们向政府提出的各项要求中，主要的一项就是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地方权力机关，管理盖尔塔奇特事务。我们声称，都柏林挽救盖尔塔奇特的尝试已告失败，因此我们——指盖尔塔奇特人民——准备肩负起这一任务，我们相信我们能够获得成功。我们还吁请爱尔兰各语言组织将其总部由都柏林迁往盖尔塔奇特，并在这里作为他们复兴事业的基地——显然，以都柏林为基地，他们的这种努力并未取得成就。然而政府既未答应盖尔塔奇特自治的要求，各语言组织也未将其总部迁往盖尔塔奇特。七十年代，部分地由于北爱尔兰情况的消极影响，盖尔塔奇特政治运动遂逐渐消声匿迹。

上文说过，唯一能阻止一个正在衰亡的语言集团继续衰亡下去的是这个集团本身，要由

他们作出决定,并采取适当措施。因此,他们想阻止这种衰亡的共同愿望乃是他们进行拯救活动的基本因素。因此推论,爱尔兰国家挽救盖尔塔奇特的尝试之所以失败,其基本原因正是由于盖尔塔奇特缺少这种愿望,而不是那种认为国家行政和发展机构能够挽救它的错误设想,这样说大约是不会错的。然而为了作出这种推断,首先应当检查一下这一事实,即盖尔塔奇特人民或任何一个正在衰亡的语言少数共同体肯定没有阻止他们的语言共同体衰亡的愿望,而且实际上,对他们自己作为一个语言少数共同体的消亡是含糊地表示赞成和愿意的。换句话说,缺乏阻止自身衰亡的愿望乃是正在衰亡的语言少数共同体的固有特征。因此,试图“挽救”这样一种共同体的任何尝试都必须从唤起他们自己挽救自己的愿望开始。

### 语言运动的作用

我们已经看到,爱尔兰政府并未认真试图在盖尔塔奇特人民中唤起这种愿望。但语言运动又怎么样呢?既然正是这一运动用挽救盖尔塔奇特的愿望鼓舞了爱尔兰国家及其历届政府,那么,为什么它又未能用这种挽救自己的愿望去鼓舞盖尔塔奇特人民呢?这部分地是因为:这一语言运动是在盖尔塔奇特外部兴起的,它主要集中在都柏林,它把它的作用主要局限于在讲英语的爱尔兰地区复兴爱尔兰语。然而更重要的则是因为这一语言运动也跟政府一样,设想通过国家机构能够挽救盖尔塔奇特。由于这两个原因,主要是由于第二个原因,这一语言运动实际上——且不说在感情上——一直对盖尔塔奇特漠不关心。

大体上说,盖尔塔奇特在这些热心的语言活动家眼里不过是一块学习爱尔兰语和消暑歇夏的地方。只有一个语言组织,即盖尔语言协会,在那里兴办了某些事业,就是这些事业也不过是纯经济性质的,唯一的例外是在马尤办了一所学校。早在本世纪初,帕特里克·皮尔斯<sup>①</sup>就曾经强调,语言运动应将其努力集中于盖尔塔奇特。然而这一运动却相反地将其努力集中于都柏林及其他讲英语的城镇,而将挽救盖尔塔奇特的事留给国家去办,这种情形多年来有增无已。

假如语言运动当初听了皮尔斯的话,假如它把主要基地建立在盖尔塔奇特,在那里宣传它的主张,兴办一些报纸,那么,它也许能成功地促使盖尔塔奇特人民产生前所未有的变化,也就是说,变成象比利时的弗拉芒人那样维护他们语言的热心的战士。这样一来,随着国家提供各种物质诱因,就有可能达到挽救盖尔塔奇特的初步要求,它的人民就有可能决定阻止逐步侵蚀,并在某些规定的地域之内坚持把爱尔兰语作为本国语言。公众作出了这样的决定,加上语言运动又倡导爱尔兰民族语言,政府就不会实行它后来实行的那种虚幻的盖尔塔奇特政策。多年以前,当盖尔塔奇特的面积比现在广大得多的时候,它的疆界也就有可能精确划定。一个类似于弗拉芒文化委员会那样的盖尔塔奇特代表机构就可以受权采取适当措施,坚持把爱尔兰语作为它的疆界之内的本国语言了。

这样一来,由于盖尔塔奇特的某些地区是爱尔兰最贫困、最不发达的地区,那些“适当的措施”便可以把基础结构和经济的发展包括进去,而盖尔塔奇特代表机构实际上就可能成为地方政府和行政机关了。

然而这些事情并未实现。语言运动在实际上对盖尔塔奇特继续漠不关心;国家并未吁请

---

<sup>①</sup> 帕特里克·亨利·皮尔斯(1879—1916),爱尔兰民族主义领袖、诗人和教育家,曾任1916年4月宣布成立的爱尔兰共和国临时政府第一任总统兼抗英武装部队总司令。

# 苏联现代语言过程和语言共同体展望

〔苏〕K·哈纳札罗夫

苏联各民族的语言正在权利平等和互相丰富的基础上发展和完善，并且日益巩固着苏维埃社会的语言基础，从根本上提高了全体苏维埃人新的交际水平。在成熟的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民族语言作用的增长，科学家面临着深入研究已提出的和新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本文就是对苏联现代民族语言的某些方面，诸如社会主义和国家语言的关系、词汇的丰富化、文字的改革和应用，以及民族接近和民族语言接近过程中的带有普遍性与特殊性的问题进行分析研究。

它卷入此事，而国家本身则从未试图说服盖尔塔奇特人民承担起本地区责任。因此，他们继续一个城镇又一个城镇地放弃爱尔兰语，一任国家徒劳地试图阻止他们的文化共同体受到侵蚀，他们只是冷眼旁观，并成为这种尝试的物质受益者。

不用说，现在的事后来领悟当初本来应该怎么办，这比二十、四十或五十年前要容易。试图阻止正在衰亡的语言少数共同体受到侵蚀，这是一项全新的事业，而且就我所知，这种尝试迄今尚未在任何地方获得成功。爱尔兰是第一个由国家及其拥有的物力来承担这一任务的国家。既然如此，我们在当时不知该怎样把这些财力和语言运动成功地配合起来加以使用，恐怕是必然的了。

## 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

然而爱尔兰政府挽救正在衰亡的讲爱尔兰语的少数共同体的尝试及其失败，给所有从事这样一项艰巨事业的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爱尔兰的事可以用来澄清某些原来不清楚的问题。一个正在衰亡的语言少数共同体是不可能靠那些不属于该共同体的热心人的活动得到挽救的。尤其是，这种衰亡是现代的中央集权国家阻止不了的，不管它的措施多么明智，用心多么良好。一个语言少数共同体要得到挽救，就只能靠它自己，而且只有当它的成员产生了阻止它衰亡的愿望，形成了一套制度，获得了采取适当措施所需的财政手段，并进而采取这些措施时，才能做到这一点。

基本的前提是他們要有阻止其自身作为一个语言少数共同体消亡的愿望，而这种愿望的产生则是通过有预见的个人或集团起作用，这些人或由他们中间产生，或者来自外部，和他们一起生活，同他们打成一片。只要有了这种挽救自己的愿望，他们几乎必然会获得采取适当措施的制度方面和财政方面的手段，除非有人用暴力禁止他们这样做。因此，我们可以概括地说，一个正在衰亡的语言少数共同体只有依靠自己才能免于灭亡，条件是它自己产生了挽救自己的愿望，且在为此采取适当措施时不是受到禁止，而是得到扶助。

（刘敦健译自英国《少数民族语言现状》，爱丁堡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